

顏真卿書法全集

第一卷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顏魯公  
像



《顏真卿書法全集》編委會

顧問 朱關田

主任 劉子瑞

副主任 楊惠東 姚建杭

委員 戴劍虹 孟德榮

劉運峰 傅建林

李齊平 袁衛民

鄭家禾

## 凡例

一、本書為顏真卿現今存世書法作品之彙集。編排順序按原作書寫立碑年代排列，部分不能確定年代的，列在最後。

二、某些重要作品，石刻拓本和木刻拓本皆收或拓本和墨迹本皆收。

三、本書所依據底本主要為宋拓本、明清拓本及最新出土發現的顏真卿所撰書碑刻。

四、凡一碑多名者，目錄和封扉中列通行名，介紹中將各名列出以作說明。

五、釋文為繁體字。異體字、通假字如『楊(揚)、楊(陽)』以括號注出正字和被通假字，異體字的判定以第十版《新華字典》為準。某些楷書從行寫法作現行的標準印刷體注釋，如『走、從、充、允、刻、袁、孩』等，直接釋為『走、從、充、允、刻、袁、孩』等；某些楷書的從篆寫法作現行的標準印刷體注釋，如『越、魚、魚、度、修』等，直接釋為『越、魚、魚、庶、修』等；楷書的從隸寫法作現行的標準印刷體注釋，如『單、晉、損、勛』等，直接釋為『單、晉、損、勛』等；與現行簡化字相同的字，不再用繁體注釋，如『尔、与、于』等字；易于辨認的俗字如『能、德』等直接注釋。

人名、地名中的固有寫法，如『沖』、『范』等字按規定注原字；印刷體新舊字形的改變如『攸、攸』等；异形部首如『𠂇、𠂇、𠂇』亦不作為異體字注釋。但《干祿字書》中的字例按原樣釋注。

六、釋文、斷句以簡體字版電子數據庫《國學寶典》之《全唐文》為主要參考資料。

七、碑帖個別破損，不能識讀者，釋文外加框。原碑殘損嚴重，擇其能辨認者釋之，因此而不能通讀的，不作斷句。釋文亦不補全。

八、本書共分八卷，第一卷至第七卷為顏真卿書法作品，第八卷為《朱關田之顏真卿研究》。



## 顏真卿書法評傳（代序）

朱關田

### 一

唐代杰出的書法家顏真卿，生于公元七〇九年即唐中宗景龍三年，卒于公元七八五年即唐德宗貞元元年八月十三日，享年七十七歲。字清臣，官至太子太師，爵封魯郡開國公，後人尊稱爲『顏魯公』。

顏真卿郡望琅邪臨沂（今山東臨沂），從十三世祖顏含隨晉元帝渡江僑居建康上元（今江蘇江寧）始，歷七代演爲江左望族。至北齊五世祖顏之推入周，舉族徙居雍州萬年（今陝西長安），爾後高祖顏思魯任職楊隋，爲東宮學士，唐高祖李淵入關，曾率子弟奉迎于同州朝邑縣之長春岩，因是授秦王府記室，其子顏師古官至秘書監，擢爲有唐新貴，以此移居京兆長安縣敦化坊，至顏真卿，業已四代。

顏真卿這一族，自西晉迄唐，以儒雅傳家，重在學識，尤以訓詁、書法見稱于世。著名如顏之推，字介，曾任黃門侍郎。博識有才辯，尤工學，精字學，著有《顏氏家訓》二十篇，大行于世。其他《承天達性記》、《訓俗文字略》、《證俗文字音》、《急就章注》、《筆墨法》、《集靈記》、《冤魂志》、《誠殺訓》、《八代談數》、《七悟》以及《稽聖賦》等著作，對後世影響也很大。其《顏氏家訓》，不獨敘述立身治家之法，辯正時俗之謬，又兼論字書音訓，

考正典故，品第文藝，文辭茂密，而能飾以經訓，爲歷代學者所尊信。當時莫不以爲篇篇藥石，言言龜鑒，凡爲人子弟者，人手一冊，奉爲明訓。顏氏子孫更是嚴循家訓，步趨惟謹，研習經史，探討小學，相沿而爲傳統。其子顏愨楚、顏游秦係顏真卿叔高祖，精《漢書》，并工訓詁，愨楚著有《證俗音略》一卷，游秦著有《漢書決疑》十二卷，淵源所自，皆出于《家訓》。

顏師古，顏真卿曾伯祖。字籀，官至秘書監。少承家業，博覽群書，與兄弟勤禮、相時，都以文學入選爲崇賢、宏文兩館學士。當時太宗以古籍久遠，且輾轉傳抄，文多訛誤，乃命顏師古考證《五經》，師古一一加以厘正。及成，太宗復召諸儒審議。當時諸儒因受傳習的束縛，爭相非議。師古乃廣引晉、宋以來典籍，一一加以解答，援據詳明，皆出諸儒意外，他們也自此嘆服。其頒行之後，朝廷用以取士，天下奉爲圭臬，迄宋數百年間，士人謹守，無有異議。顏師古也曾用《家訓》訓導之義，爲太子承乾注《漢書》，一時譽爲『班孟堅之忠臣』。有文集六十卷（已佚），所著《匡謬正俗》八卷，《急就章注》一卷以及《顏氏字樣》，承祖先之餘緒，啓三唐之門戶，作爲唐代正字學的先驅者，而名垂史冊。

顏元孫，顏真卿伯父，字聿修，官至濠州刺史，贈秘書監，精究訓詁，尤善書翰，玄宗有贊：『翰墨之妙莫之與先』云。有

文集三十卷（已佚）。所著《干祿字書》，選楷書一千五百九十九字，以平、上、去、入四聲的次序排列，其中大部分的字，又分別標出正體、通體、俗體三種寫法，如『威、臧、臧，上俗中通下正』。同時，書中還對某些形近、音近的字作了區別，如『藉、籍，上藉草下簿籍』『淫、媼，上淫蕩字音淫，下妖媼字音遙』。唐代科舉，并重字法，『楷書字體，皆得正詳。』『既考文辭，兼詳翰墨，升沉是繫，安可忽諸，用舍之間，尤須折衷，目在干祿，義在茲乎？』（《干祿字書序》）正因為當時學習字法和求取名關係很大，《干祿字書》影響十分廣遠，顏元孫也隨之蜚聲朝野，不僅名高一代，而且飲譽後世，被尊為正字學的始祖。顏真卿出生時，元孫正自涪州長史遷為滁州刺史，因為拒絕按察使王志愔的女兒婚事，被誣奏，降階奪祿，黜歸田里。由是傲然閑居垂十年。其間，除了與陳郡殷踐猷、上谷寇泚、武功蘇晉、吳郡陸象先等文華人士交游外，便以教誨子弟為樂。他給予顏真卿的教益特多，顏真卿曾在他的《神道碑銘》中說：「真卿越自嬰孩，特蒙獎異，且兼師父之訓，豈獨猶子之恩。」（《顏魯公文集》卷九）所著《干祿字書》，由顏真卿于大曆九年（公元七七四年）書後立之湖州。有五子，都能紹繼父業。春卿，明經入仕，以詞翰擅名；杲卿，文理清峻，見稱于時，後來以身殉國，名垂青史。其他曜卿工草隸，旭卿善草書，茂曾精訓詁，也并有才名。他們與顏真卿是同堂兄弟，同條共貫，聲氣應求，大概與其熏陶有關。

至于書法，誠如顏真卿《草篆帖》所說：「自南朝以來，上祖多以草隸篆籀為當代所稱。」不獨九世祖顏騰之（宏道），因草書有風格，見稱于梁武帝《草書評》；六世祖顏協（子和），以工草隸，有名荆、楚間。其他，顏真卿的八世祖顏炳之（叔豹）、曾祖顏勤禮（敬）也曾以能書名世。祖父顏昭甫（周卿）則有碩儒之稱，擅長篆、隸、草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而勁利却超過他。當時有人進獻古鼎，銘篆二十餘字，舉朝臣子都不能識，獨昭甫能全部讀出，因而得到了伯父顏師古的賞識，凡師古所注史籍，必使與參定。父親顏惟貞自少失怙，寄養在舅氏殷仲容家，和其兄元孫一起授受殷氏筆法。家貧無紙筆，乃與兄用黃土飾牆，以

木石為筆，畫而習之，後來俱以草、楷擅名。以木石作筆，書畫泥牆，必須提空作業才能揮運，其執法自以撮管或握管為宜。由此推想，顏真卿書寫擘窠大書，雄健寬厚，不同凡響，或出自家法。顏惟貞字叔堅，當時，他正在東宮任太子文學，「侍奉文章」。第二年六月，因歷官清白被選為薛王隆業的僚屬，陪侍規諷，引以為親信。公元七一年（景雲二年）七月卒于薛王友任上，時顏真卿年僅三歲。顏氏子孫大都年幼喪父，這恐怕也是顏氏家傳，遠如顏協，近如顏元孫兄弟，都是早年失怙，并由舅氏養育。其所以琅琅成名，成為當時人才，或許與他處身清儉而能勵精求成的家風有關。

母親殷氏，出身于陳郡名門望族，她的曾祖聞禮、祖令言、伯祖令名及其父親子敬都以儒學、書法聞名于世。而且殷氏世代與顏家聯姻，殷英童女為思魯夫人；殷令名女、殷仲容姐為昭甫夫人；顏之推夫人以及顏勤禮原配夫人也是殷氏女。而顏真卿姑母顏真定則是殷履直的夫人，即殷仲容的堂侄媳婦。惟貞夫人是殷踐猷的長妹，殷仲容的堂侄女。殷氏一門書法以殷仲容最著名，對顏氏的影響也最大。唐人竇息《述書賦》記殷仲容、王知敬榜書齊名于武則天朝。有「大乃有則，小非無據。麒麟將騰，鸞鳳欲翥」之稱。顏真卿父輩的筆法全出于殷仲容，尤其伯父元孫，守法不二，幾可亂真。顏真卿曾經記述當時的情境，說：「仲容以能書為天下所宗，人造請者箋盈几，輒令代遣，得者欣然莫之能辨。」（《顏魯公文集》卷九《朝議大夫守華州刺史上柱國贈秘書監顏元孫神道碑銘》）顏真卿的母親殷氏中年守寡，遺孤十人，家境清貧。真卿自幼隨母寄居在京師通北坊的殷家，依靠舅氏殷踐猷生活。殷踐猷字伯起，當時正任曹州司法兼麗正殿學士，對顏真卿的幫助很大。直至公元七二一年（唐玄宗開元九年）七月舅氏殷踐猷亡故，顏真卿遂隨母南下蘇州，寄居在當時任吳縣令的外祖父殷子敬官舍，時年十三歲。

顏氏家教素來縝密，《教兒嬰孩》，是為明訓。顏真卿孩提之年，除了母親悉心垂訓，伯父、舅氏鞠養誘誨之外，姑母顏真定也孜孜教誨，不僅切正言詞，學習音辭之業，而且還教以詩賦，輔導

閱讀諸如王延壽《王孫賦》、崔氏《飛龍篇》、江淹《造化篇》以及《五都賦》等古代名篇，從而奠定了顏真卿文學藝術的基礎。『至若發慮學文之親，立身復禮之道』，則歸功于二兄允南的規勸和教導。二兄允南，字去惑，長真卿十五歲，少以辭藻擅名，兼工草篆書，尤善五言詩，深為伯父元孫所賞識。及展，以『精識』見重于父執侍郎寇泚以及相國陸象先、尚書章陟、陸景融諸人。又以『善與人交，篤于僚友』的品行為世所尊，與相國房琯、尚書章陟、張倚有着忘年之交。又和河南陸據、彭城劉鍊、劉秩、隴西李揆、河東裴士淹諸名士結為莫逆之誼。河東敬括、隴西李華、李涵、范陽盧允畢，盡常僚之好。顏真卿後來的社會關係以及個人品德尤其是親仁誠物、泛愛虛己的操守與這位兄長有很大的關係。

## 二

公元七三三年（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二十五歲的顏真卿參加京兆府府試，不久被府舉選參加尚書省開元二十二年的進士科考試。當年典試主試人是以清鑒著稱的孫逖，試題分別為《梓材賦》、《武庫賦》。《梓材賦》即以「理財為器，如政之術」為韻，顏真卿以甲科舉第。唐制，科舉考試一般在正月舉行，二月發榜。發榜後，凡及第進士例當參加如拜謝座主、參謁宰相等一係列的禮節和儀式，然後還必須宴集，著名的如曲江之宴、雁塔題名、杏園探花、月燈打球等。顏真卿以善書為同年進士題名于雁塔，此即為顏真卿見諸著錄最早的書迹，載宋無名氏《寶刻類編》。

顏真卿進士及第後即娶太子中書舍人韋迪之女為妻。韋迪是房州刺史章景駿的兒子，史學家韋述的二弟，曾見稱于名相張說，有『人之杞梓』（《新唐書》卷一三二《韋述傳》引）之謂。其兄韋述是顏真卿舅氏殷踐猷的摯友，曾在書府四十年，居史職二十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雅有良史之材，蕭穎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家有藏書二萬卷，皆自校定刊鉛，史稱：『黃墨精謹，內秘書不逮也。』（《新唐書》卷一三二本傳）且他還收藏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晉以來草隸真迹數百卷，古碑、古器以及錢譜、璽譜之類和當代名公尺牘題記。顏、韋結為姻親，韋氏的

史才博識對這位侄女婿有一定的影響和幫助。

公元七三六年（開元二十四年），顏真卿二十八歲參加吏部銓選，所作《對三命判》選為甲等，擢拔萃科，即授朝散郎、秘書省著作局校書郎。任職二年，因母殷夫人亡故洛陽，停職赴喪，服孝三年，于天寶元年（公元七四二年）歸里。這年秋天，經扶風郡太子崔琇薦引參加『博學文詞秀逸科』的制舉考試，又以甲第登科，十月依資授醴泉（今陝西醴泉）縣尉之職。秩滿，關內道黜陟使王錡以清白薦舉，授通直郎，遷長安縣尉。當是時，左率府長史張旭正在京與賀知章以及汝陽王璣、李適之、崔宗之、蘇晉、李白、焦遂諸名士結為『酒中八仙』。

張旭字伯高，吳郡崑山（今江蘇崑山）人，一作吳郡吳（今江蘇吳縣）人，進士出身，善詩，尤擅七絕，清新俊逸，與賀知章（會稽）、包融（潤州）、張若虛（揚州）齊名天下，有『吳中四士』之稱。張旭是陸彥遠的外甥（盧携記張旭言），與賀知章為從表兄弟。宋施宿《會稽志》曾引《金壺記》：當時張旭與賀知章常常并驅游覽吳、越名勝，『凡是人家廳館好墻壁及屏障，忽忘機興發，落筆數行如蟲篆鳥飛，雖古之張（芝）、索（靖）不如也』。嚴峻如寶氏《述書賦》，評述歐、虞以後書家，多有譏貶之詞，而于張旭、賀知章，則備加推崇。他在評張旭時說：『酒酣不羈，逸軌神澄。回眸而壁無全粉，揮筆而氣有餘興。若遺能于學知，遂獨荷其顛稱。雖宜官售酒，子敬揮帚，遐想邇觀，莫能假手。拘素屏及黃卷，則多勝而寡負，猶莊周之寓言，于從政乎何有。』蔡希綜《法書論》記其書法『意象之奇，不能不全古制，就王之內彌更減省』，當時議者以為王獻之再出。李肇《國史補》卷上也記：『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張長史，無閑言矣。』唐文宗甚至將他的草書與李白詩歌、裴旻劍舞，并稱為有唐『三絕』。顏真卿曾師從張旭，蒙受筆法，他曾在《草篆帖》中自言：『真卿自南朝來，上祖多以草隸篆籀為當代所稱，及至小子，斯道大喪，但曾見張旭長史，頗示少糟粕，自恨無分，遂不能佳耳。』又在《懷素上人草書歌序》中說：『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為真正。真卿早歲，嘗

接游居，屢蒙激勸，告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用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當時賀知章居住在長安宣平坊，距顏真卿敦化坊的祖宅很近。他是顏真卿的父執，又與顏氏長輩殷踐猷、韋述、顏元孫過往甚密，且係張旭的姻親，顏真卿師事張旭，或與他有關，時當始于進士及第之後。

天寶九載十二月顏真卿再入御史臺為侍御史，百餘日遷兵部員外郎。公元七五二年（天寶十一年載），顏真卿四十四歲，自長安尉，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東都畿採訪使判官。是年兵部改名武部。按唐制武官選授，必經兵部三銓，即尚書中銓、二侍郎東、西銓。『凡試能有五（長垛、馬步射、馬槍、步射、應對），較異有二（驍勇、材藝及可為統領之用）。審其功能，而定其留放，所以錄才藝、備軍國、辨虛冒、叙勳勞也。然後據其資勞，量為注擬』（《舊唐書》卷四十三《職官二》）。顏真卿所任的『掌判南曹』之職，負責選人『解狀、簿書、資歷、考課』等檔案文書的考核。選授一般集于孟冬，平日是十分清閑的，所以顏真卿在武部任上悠閑于筆墨之間，先後書撰了《郭虛己碑》、《郭揆碑》。尤其同時書寫了岑勛《多寶塔感應碑》，其勻稱緊密，成為顏真卿存世碑版中年份最早的一通，得到後世的珍重。近年出土的《王琳墓志》和《郭虛己墓志》雖然早于是碑，但因其墓志形小字細，聞世又遲，影響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多寶塔在長安東面興平縣（今陝西興平）千福寺內，公元七四二年（天寶元年）朝廷敕內侍趙思偏贈錢二十萬，絹千匹助建之。天寶四載（公元七四五年）塔成，萬眾瞻禮，驚響四方，可謂轟動一時。顏真卿友朋詩人岑參曾有《登千福寺楚金禪師法華院多寶塔》詩稱述之。是年沙門楚金請岑助撰寫《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寶塔感應碑》文，由顏真卿楷書寫，鐫刻入石，立于塔下。是碑楷書，由于碑石質地上乘，又加以精鏤細刻，所傳善本，鋒芒猶新，用筆豐厚腴潤，結體勻稱謹嚴，便于初學，遂流傳甚廣，至清代幾乎家有一本。然而，明代以往，論書者多加痛貶，以為俗書，有『近世椽吏家鼻祖』之謂。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評之說：其書『小遠大雅，不無佐吏之恨』。盛時泰視嗜者如逐臭

之夫，其在《潤蒼軒碑跋》中說：『魯公書《多寶塔碑》最窘束，而世人最喜，正如杜少陵詩佳處滿卷，而學者徒取其硬澀。此殆曹子建所謂蘭茝馨香，人之所嗜，而海畔有逐臭之夫者也。』

一物既立，必存仁智互見之說，稱述《多寶塔碑》，以為勝過顏氏他帖者，也大有人在。楊賓《鐵函齋書跋》稱：『魯公書前輩多推《宋廣平碑》與《爭位帖》，而《楚金感應碑》則在所痛貶，余謂《廣平》、《爭位》未嘗不佳，然求其始終一貫，無一懈筆，則莫有過《楚金》者，以魯公全力所在故也。』王澐《竹雲題跋》以為『以渾勁吐風神』是顏魯公得意之作。他說：『此碑書法腴勁最有態度。魯公書多以骨力健古為工，獨此碑腴不剩肉，健不剩骨，以渾勁吐風神，以姿媚含變化，正是年少鮮華時意到書也。』

舊制：『十歲入小學，學書計。』（《隋書》卷二十七《經籍一》）顏真卿早年『學書計』，自然出于家庭的傳授，受到殷仲容書風的影響，或如其伯父、二兄全仿古人。加上書法自陳隋以來，漸趨勻整，入唐則更加嚴正，斂入規矩。顏真卿曾參加吏部銓選，而其銓選『楷書道美』為其擇人四才之一。這種『楷書道美』的標準，是受到當時時代書風的左右。是時，褚遂良為一代教化主，天下習褚書者十之八九。褚歿之後，薛稷、鍾紹京、魏華、魏栖梧輩并主書壇，狂逸如張旭，其楷書《郎官石柱記》平實勁健，也難脫盡時代的風尚，更何況承緒家法的顏真卿。顏真卿書《多寶塔碑》時，年屆中年，其書之所以勻稱腴勁，秀媚多姿，不同于他以後所書碑版的風貌，正是時代使然，豈能嚴加苛求，以後責前。

大抵一代書家風格的形成，必然經歷承襲、醞釀、萌生、發展諸階段。顏氏為山左望族，北齊的《泰山金剛經》、《文殊般若經碑》，隋代的《曹植廟碑》便是他的書風所自出。近年南京新出土的東晉《琅邪顏兼婦劉氏墓志》，大家認為書體有似後來的顏真卿，顏真卿當然未曾見過此石刻，但由此可以推知顏氏先世已經存在這種書風了。《多寶塔碑》為顏真卿早年書法，雖然受到殷仲容以及二王、褚遂良、張旭諸家的影響，但已在此基礎上趨于精密腴勁，成為顏真卿書體的初期面目。後人學顏，多見其勻稱粗

陋處，正如學歐陽詢書而致臺閣體，這便是庸師俗眼所致，咎當自取，不該委過于《多寶塔碑》。

此碑題額人徐浩，字季海，越州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時官檢校都官郎中，與顏真卿同時為尚書省官員。都官郎中，從五品上階，秩高顏真卿一品。且徐浩生于長安三年（公元七〇三年），大顏真卿六歲，米芾《海岳名言》謂：「徐浩為顏真卿辟客。」按：顏真卿平原太守任上確有一位名徐皓的門客，但他後來成為義軍將領，而這位徐浩，時正任武部郎中，遠在京師，或浩、皓，音近，米芾不察，誤記。顏、徐并為書家，且同值臺省，或當有所過從，惟史不記，甚可惜也。

公元七五二年（天寶十一載）四月，御史大夫兼京兆尹王鉞，得罪被誅，楊國忠接任京兆尹。五月，楊國忠加御史大夫，京畿、關內探訪使。十一月又進為右相，兼文部尚書。這位緣椒房而位至宰相的小人，「蔽主聰明，秉性讒慝」，成為繼李林甫之後又一位有名的奸相。他一身兼領四十餘使，直以天下為己任，「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懾」。「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為己用者皆出之」（《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王鉞之罪係楊國忠所加，史記王鉞「恩寵侔于國忠，而位望居其右。國忠忌其與己分權，會邢縉事泄，乃陷鉞兄弟誅之」（《舊唐書》卷一百六楊國忠傳）。而顏真卿是王鉞薦引的臺省官，又曾經授領御史中丞宋渾，派係不同，難為國忠所容。于是，乘朝廷選派尚書省官員充兵部郡守的機會，便以精擇能吏為幌子，將顏真卿排逐出中央政府，到二千五百里之外的平原郡（州治所在今山東德州）去擔任地方官。這時，顏真卿的詩友岑參，正隨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入朝，滯留在長安，曾作長歌送行之。

平原郡屬于河北道，在當時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兼河北采訪處置使安祿山的管轄之中。而這時，安祿山陰蓄異志已經十年，朝廷內外莫不知其將反，只是礙于玄宗一味的庇護不敢言而已。顏真卿身處狼虎之地，以虞不測之禍，便托以防範霖雨，加緊修固城牆，浚疏壕水，且登記壯士能人，儲備糧米柴草，積極做好反叛亂的準備。與此同時，却廣延文士，或泛舟飲

樂，或登高賦詩，又與郡人封紹、高質等人修纂《韵海鏡源》。公元七五四年（天寶十三載）冬，雖然有人向安祿山告發，安祿山也曾派親信殿中侍御史平洌，監察御史閻寬、李史魚，右金吾曹曹宋嘗以判官的身份前來平原巡察，由于顏真卿早有準備，當他聞訊之後，又能坦然策馬，親至境上迎候，并且還和他們一起狎游了東方朔神廟，加上平洌原是顏真卿憲臺的同僚，平原郡表面上又全是一些競浮華、奔實行的緣飾文治之事，從而蒙蔽了安祿山的耳目。顏真卿雅興如是，安祿山便以為一介書生，不足以慮，所以自始至終未加以防範。及范陽兵起，諸郡莫敢抵禦，惟有平原城池堅固，兵強馬壯，賴以守禦，遂知顏真卿并非等閑之輩。

東方朔神廟在平原郡安德縣（今山東陵縣）東北二十里處，開元八年（公元七二〇年）德州刺史韓思復刻有晉夏侯湛所撰的《東方先生畫贊碑》，顏真卿陪同平洌等人狎游至此，見其文字纖靡，駁蘚生金，四十年間已不可辨識，感嘆之餘，便揮毫重書之。此即著名的《東方先生畫贊碑》。是時顏真卿撰有三碑，一紀顏氏先賢曹魏時顏裴、高齊時顏之推先後為平原太守，至顏真卿已三典茲郡；一紀周時臺省擢牧諸郡者十餘人。其三即此碑。是時鐫刻已畢，惟幽方起逆，未能立于廟前。時年四十六歲。

是碑書法後世評述特高，蘇東坡歷評顏公諸碑，認為《東方朔畫贊》是為清雄。他說：是碑「字間櫛比而不失清遠。其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書，雖大小相懸，而氣韻良是，非自得于書，未易為此言也」（《蘇軾文集》卷六十九）。王澐也稱其為顏公中年得意之書，有「神明煥發而時出姿態，不失清遠」（《竹雲題跋》）之譽。

顏氏世代以儒雅傳家，偏重書記。其探討小學，留意翰墨，真、草書迹，無頓狼狽者，為立家明訓，莫不克尊是守，步趨惟謹。雖然「自南朝以來，上祖多以草隸篆籀為當代所稱」，著名如九世祖顏騰之，因草書有風格，見稱于梁武帝；六世祖顏協以工草隸，有名荆、楚間，但五世祖顏之推却視之為雜藝，其《顏氏家訓》明言「此藝不須過精」。又諄諄告誡「慎勿以書自命」。顏真卿秉承家教，亦慎勿以書自命，書契之作，楷正是敬，意在適

用記事。惟其性之愛重，所見亦多，玩習趨變，隨意自娛，不求其名而反顯其名。

《多寶塔感應碑》、《東方先生畫贊碑》，并為顏真卿中年所書，相隔僅二年。《多寶塔》岑勛撰文，文章多誇飾之辭，其叙沙門建塔之事，光怪夢寐，雲物感應，大多不可致詰。《東方朔畫贊》，夏侯湛所撰，其詭譎而寓壺公蘊子之意，然而魯公一一以方整之筆書之，一無性情可見。其銘石記事之間，實類似秘書省楷書手謄錄善本，一筆一畫，意在文字楷正為善。其方嚴腴勁、秀媚多姿者，乃平常書判寫牘功夫。不獨魯公如是，徐浩亦然。惟徐浩久處中書，制誥書冊不易蛻變而已。

顏真卿幼承門業，并重真草。大抵唐代行草書，以二王為正格，自歐、虞以下，莫不善加摹習，惟《聖教》一出，斂入規矩，李邕以行作楷，趨于平實。開元天寶間崇尚隸書，其豐茂碩厚，一改初唐行草筆勢，且張旭晚年，通變適懷，除繁就省，由正復草，用筆亦由清健演為圓勁。顏真卿真草兼通，用筆大凡三變，初則清健，源于母族殷氏，而得力于張旭，上引兩碑及《金天王廟題名》、《離堆記》約可見其梗概；廣德以後，趨于圓勁，楷書以《郭氏家廟碑》、《顏勤禮碑》為代表，行草書則推《祭侄季明文》、《爭坐位帖》為杰作。

《祭侄季明文》作于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年）九月三日，《告伯父濠州刺史文》作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均早于顏杲卿神道碑銘。侄季明，即顏杲卿第三子，當年其父揭旗反正之時，正是由他往返常山、平原之間傳遞消息，使兩郡聯結，形成犄角之勢，齊心效忠王室。顏真卿在祭文中追述道：「惟爾挺生，夙標幼德，宗廟瑚璉，階庭蘭玉，每慰人心，方期戡穀。何圖逆賊間置，稱兵犯順，爾父竭誠，常山作郡，余時受命，亦在平原。仁兄愛我，俾爾傳言，爾既歸止，爰開土門；土門既開，凶威大蹙，賊臣不救，孤城圍逼，父陷子死，巢傾卵覆。天不悔禍，誰為荼毒，念爾遭殘，百身何贖。」顏季明橫遭殺戮，正當英年，且歸葬時已失身軀，僅存頭顱，撫今追昔，不由得顏真卿疾痛慘怛，哀思鬱勃。所以當他援筆作文之際，縈紆忿激，血淚交迸，悲憤交加，情不能自禁，

其意固不在文字之間，而頓挫縱橫，一瀉千里，終為千古絕調。

黃庭堅說：「魯公《祭侄季明文》文章字法皆能動人。」（《山谷題跋》）當天寶末年，安祿山叛軍自漁陽而下，狼奔豕突河北二十四郡，如入無人之境，只有顏氏兄弟子侄挺身而出，堅決抵抗，取義成仁，以致一門英烈，標格炳炳。顏真卿此文，正義凜凜，并不是一般祭悼的文章，所以有不忍卒讀之感。其書法尤為奇絕，論者以為《蘭亭》以後，惟此為高，故有「天下第一行書」之譽。董道《廣川書跋》稱：「峻拔一角，潛虛半股，此于書法，其體裁當如此矣。至于分若抵背，合如并目，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然後成書，而古人于此，蓋盡之也。魯公于書，其過人處，正在法度備存而端勁莊持，望之知為盛德君子也。」陳深也說：「此帖縱筆浩放，一瀉千里，時出遒勁，雜以流麗，或如篆籀，或若鐫刻，其妙解處，殆出天造，豈非當公注思為文而于字畫無意于工，而反極其工邪！」（《停雲閣帖題記》）

衆所周知，顏真卿自從出守平原以來，修城浚池，陰養壯士，儲糧草，備戰事，以預范陽兵變。及安祿山揮麾南下，諸郡先後陷落，唯獨平原一城固守，首倡討賊之義，應之者相繼而起，河北十七郡復歸朝廷。其後取堂邑，克魏郡，首挫叛軍逆勢，又讓功于賀蘭進明，質子于劉客奴，資助李光弼，聲援郭子儀，且聯合諸郡義士，傳遞朝廷消息，使各路義軍相互聲援，配合勤王，共事討叛復國大業，有效地牽制了安祿山西進力量，使朝廷得以重振旗鼓，共謀抵禦之策，調兵遣將，同事討伐之役。唐之亡，賴顏真卿之力最多。然顏真卿不矜功，不伐能，惟以興復為己任，最後竟擬以敗將請罪，「若朝廷必誅敗軍之罪，以勵天下，則王綱可振，死亦何恨。」忠厚疏暢如是，真令人凝重沉鬱，肅然起敬。

公元七五六年（至德元載）十月二十二日，顏真卿率領諸將放弃平原郡，南渡黃河，奔赴肅宗小朝廷所在地鳳翔（今陝西鳳翔）。因當時陝、洛一路盡被亂兵占據，道路梗阻，不能前進，便改道江淮，自荊襄取上津路，北詣行在。當其途經武當（今湖北均縣）時，奉詔遷為憲部尚書。其後于翌年四月到達鳳翔。

肅宗即位之時，文武官員不滿三十人，其中并無特出的人才，

且朝廷初建，綱紀鬆弛。肅宗深知顏真卿德重才博，正直剛毅，又曾任職憲臺，頗有聲名，乃命顏真卿兼任御史大夫之職，長官憲臺，『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朝廷』（《舊唐書》卷四十四《職官三》）。公元七五七年（至德二載）九月收復長安，十月收復洛陽，是月十九日顏真卿扈從肅宗返回西京長安。顏真卿自二十六歲登科、三十四歲出任校書郎九品官以來，以盡職爲己任，忤權臣，陵焰勢，盡職憲臺，對那些『身兼數官，苟貪權利，多致顛覆，害政非一，妨賢實多』（顏真卿《讓御史大夫表》）的現象，嚴加整肅，以圖重整朝綱。鋒芒初試終爲宰相所忌，以『事乖執法，情未減私』的罪名，于十二月出貶爲同州（州治所在今陝西大荔）刺史。翌年三月轉任蒲州（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濟），充本州島防禦使，且晉爵爲丹陽開國侯。時年五十歲。同時，朝廷又追贈乃祖顏昭甫爲華州刺史，五月追贈堂兄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祭侄季明文》則撰書于是時。顏真卿這位『股肱之臣』由于酷吏唐明的誣告，祭侄之後，即由蒲州左遷饒州。當他南下饒州，途經洛陽的時候，曾祭掃伯父元孫之墓。《告伯父濠州刺史文》這篇稿文即寫之于墓前，因告以顏杲卿一門恤贈，戚屬還京，生死哀榮的情況，所以心平氣和，容夷婉暢，無《祭侄稿》那種令人鬱悒的奇崛之氣。這篇書法也因此不同于《祭侄稿》，正如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所說的一樣：『頓挫鬱勃，少遜于《祭侄稿》，而其風神奕奕，則《祭侄稿》終似不及。』惟真迹早佚，傳世刻本，最早見于《淳熙續帖》，其筆力緩弱，不類魯公，或許宋代時已有僞迹。按明年正月立有顏真卿書撰的《顏杲卿神道碑》，顏真卿既然有《祭侄季明文》和《告伯父濠州刺史文》兩稿，照理也應當有祭兄之文，而其文意雄絕悲愴處，例當與《祭侄》、《告伯》相類，或更甚之，惜文不傳，終難見其杰構。

公元七六三年（廣德元年）七月，吐蕃自大震關入寇唐土，陷蘭、鄜、河、鄜、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十月降涇州，入邠州，掠奉天、武功，京師震駭，代宗倉猝出奔，經華州，東至陝州（今河南陝縣）。吐蕃入京師，焚掠一空。汾陽王、關內副元帥郭子儀以四千兵力從禦宿川反擊，引軍藍田，吐蕃惶

駭遁去。長安克復，代宗于十二月車駕返都。次年十一月，汾陽王郭子儀父子自涇陽凱旋，代宗命宰臣百官在京城西郭開遠門迎接，并在安福寺舉行興道之會。興道會上，按禮魚朝恩只能序于十二衛大將軍之後，若爲了顯示他的尊崇，也只能在宰相班列中橫安一位。但是尚書右僕射郭英又却把他的座位安排在僕射一行，禮遇高于吏部尚書李琗、禮部尚書李之芳、工部尚書崔渙諸尚書之上。顏真卿時爲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檢校』，唐代是『辦理』的意思，是作爲尚未實授的稱謂，但作爲御史大夫，有責任『刑憲典章』，『肅正朝廷』。于是，顏真卿向這位恃富而驕的定襄郡王郭英又提出了嚴正的批評，著名于史的《與郭僕射書》便撰寫于這樣的背景下。當時顏真卿五十六歲。他在《與郭僕射書》中說：

『前者菩提寺行香，僕射指麾宰相與兩省，臺省以下常參官并爲一行坐，魚開府（魚朝恩）及僕射率諸軍將爲一行坐，若一時從權，亦猶未可。何況積習更行之乎。一昨以郭令公（郭子儀）父子之軍，破犬羊凶逆之衆，衆情忻喜，恨不頂而戴之。是有興道之會，僕射又不悟前失，竟率意而指麾，不顧班秩之高下，不論文武之左右，苟以取悅軍容爲心，曾不顧百僚之側目，亦何異清晝攫金之士哉！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聞姑息，僕射得不深念之乎？……鄉里上齒，宗廟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威以明長幼，故得彝倫叙而天下和平也。且上自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已上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然，未嘗參錯。至如節度軍將，各有本班，卿監有卿監之班，將軍有將軍之位，縱是開府，特進，并是勳官，用蔭即有高卑，會宴合依倫叙，豈可裂冠毀冕，反易彝倫，貴者爲卑所凌，尊者爲賤所逼，一至于此，振古未聞。……古人云：「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願僕射與軍容爲直諫之友，不願僕射爲軍容佞柔之友。……朝廷紀綱，須共存立，過爾墮壞，亦恐及身，明天子忽震電含怒，責赦彝倫之人，則僕射其將何辭以對。」（《顏魯公文集》卷四）

魚朝恩是一介宦官，刑餘之人，他擠郭子儀，折元載，抑相

里造，侵王縉，一時氣焰萬丈。郭英又初領神策軍的時候，魚朝恩便是他的監軍，其後，郭英又升為僕射，魚朝恩便獨掌禁兵，從上屯駐苑中。郭英又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一改驕橫縱恣之習，低眉折腰，百般諂媚于他，以至于藐視禮儀，破壞綱紀。顏真卿為了維護朝廷綱紀，執掌禮儀，便秉義直諍，既斥郭英又之佞，復奪魚朝恩之驕，粲然忠義之氣，橫溢于文字之間，至今一千餘年，尚凜凜有生氣，讀之莫不令人肅敬而尊重。

這帖書法，米芾以為魯公行書第一，他說：「字字意相聯屬飛動，詭形異狀，得于意外，世之顏行書第一書也。」（《寶章待訪錄》）又說：「此帖在顏最為杰思，想其忠義憤發，頓挫鬱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書。」（《書史》）黃庭堅也說：「觀魯公其帖，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來風流氣骨，回視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徐（浩）、沈（傳師）輩，皆為法度所窘，豈如魯公肅然出于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蓋自二王後能臻書法之極者，惟張長史（旭）與魯公二人。」（《山谷題跋》）米芾、黃庭堅是宋代書壇巨擘，猶推崇贊嘆如此，朱長文《續書斷》首列顏真卿此帖為神品，蓋不無緣由。

### 三

公元七六六年（永泰二年）二月，顏真卿在刑部尚書任上，遭到權相元載的排斥，坐以誹謗朝政的罪名出貶為峽州（州治所在今湖北宜昌）別駕。昏庸的代宗則以為罰不當罪，又改貶為吉州（州治所在今江西吉安）別駕。

吉州屬江南道，離京三千六百五十里，顏真卿遠謫南楚，從正三品的京官遽然降到五品下階的上州別駕，且當時夫人韋氏正在病中，雖經太子太保李光進饋送鹿肉脯佐藥，也未見痊愈，加上自元載專政以來，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往往不能自給，經常得向地方官借貸。這位刑部尚書的家境十分清苦，曾向李光進多次求助，他在《乞米帖》中說：「拙于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竭，只益憂煎，輒恃深情，故今投告，惠及少米，實濟艱勤。」顏真卿以罪遷謫，朝廷又不供給驛馬，舉家南遷，唯

靠備乘私車民船，所以自二月初九出京，至十一日到藍田，短短的八十里路竟費了三天時間。這時顏真卿的心情雖然淒涼交臻，鬱悒侘傺，但忠義之心并不以小人洶洶而輟止。他在《與緒汝書》中說：「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時，為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耻。緒汝等當須會吾之寸心，不可不守也。」顏真卿因忤大奸，顛跌撼頓，一至于此，然而至今尚念念不忘為國守政，這種「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慨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顏真卿《郭汾陽家廟碑》）的忠厚品操，致使道學家朱熹拍案叫絕，嘆贊曰：「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王龜齡集序》）雖然如此，但顏真卿自從遽遭貶謫以來，在公務之暇，已一改常態，開始寄情山水，沉湎詩文，依托佛道，以求解脫。當他途經江州（今江西九江）上廬山游宿東林寺時，與熙怡律師結為參禪之侶。第二天，六月二十一日，即大曆元年五月初九游西林寺，拜晤內弟殷寅的阿闍黎法真律師。當時，律師出示張僧繇畫、盧舍那佛像以及梁武帝綉花鉢袋的奉佛遺物，魯公見後，情不自禁地在歐陽詢所撰《永公碑》的碑陰上題記云：「法真律師深究清淨毗尼之學，即律祖師志恩之上足，余內弟正義之阿闍黎也。」阿闍黎原是印度婆羅門教授經卷時弟子對師長的稱呼，殷寅成為法真律師的世俗弟子，看來顏真卿是十分贊許的。顏真卿第二子顏頊的小名叫穆護。穆護原是西方祇教僧職的稱謂，顏真卿把它作為兒子的乳名，也可見他對西來宗教的服膺。其後，在撫州（今江西撫州）刺史任上，書撰《南岳魏夫人仙壇碑》稱頌紫虛元君魏華，又撰《井山華姑仙壇碑》為女道士黃令微立傳，并為神霄觀道士譚仙岩書寫馬伏波語，其他《謝康樂翻經臺記》、《華蓋山王郭二真君碑記》、以及《逍遙游》赫赫三大字，已開始對佛道表示一定程度的尊重和欣賞。尤其《托陶淵明》詩：

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

狙擊不敢就，含生悲縉紳。

嗚呼陶淵明，奕葉為晉臣。

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

題詩庚子歲，自謂義皇人。

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

興逐孤雲外，心隨飛鳥泯。

詩中所表現出來的陶淵明式的遁世思想，雖然是暫時的，但已經與當年叨念寵命階位、事事處處含恩戴德、拳拳款款、剛正執着，且以精勵盡職、克效忠勤為崇高責任的顏魯公儒家思想格格不入。

顏真卿崇重浮屠之說，本出自家教，其「兼修戒行，留心誦讀，以為來世津梁」（《顏氏家訓·歸心》）為顏氏傳統。其交游皎然，相契嚴峻，友善上恒，褒昇沈真乘之出家，敦慕謝靈運之釋經，而且以「深于禪味」（《宋高僧傳》卷二十六《唐湖州佛川寺慧明傳》）為湖州佛山寺慧明法師「菩薩戒弟子」。至于探勝訪迹，撰文紀頌，寫經書贊刊石傳布諸多佞佛之舉，更是集中在此後十數年的貶謫時期。著名的《八關齋會記》便是明證。當年顏真卿罷撫州任（大曆七年五月）回京途經宋州時，適逢其州刺史徐向為了禳祈報恩，替田神功設八關齋會，并求魯公撰記頌述之。按：八關齋會始于齊武永明元年（公元四八三年），以釋氏八戒為齋。所謂八戒者：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六不着花鬘纓絡，香油塗身；七不得坐高廣大床；八不過齋後吃食。俗眾所受，一日一夜，戒也，謂八戒一齋，通常叫八關，以明禁防。自大曆以來，王縉、元載、杜鴻漸之流以因果之說，熒惑人主，引阿修羅希釋為證，每虜至，禮佛祈禱，退則修八關齋飯僧報謝。嘗令僧百餘人入于宮中，陳設佛像，經行念誦，謂之內道場。于是州郡將吏，群而仿效。田神功為魯公推引之人，一介武夫，得遇安史之亂，樸勇立勳，位至節度使。上元元年（公元七六〇年）十一月，劉展在潤州作亂，不久攻陷揚州，揚州刺史鄧景山引田神功討伐劉展，于第二年的二月，生擒劉展，克復了揚州。田神功進城後，大肆侵略百姓財物，《舊唐書》卷一一〇《鄧景山傳》曾記：當時「神功至揚州，大掠居人資產，鞭笞發掘略盡，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數千人」。觀此，田神功誠非良臣。但因為有克平宋州之功，當他寢疾之時，徐向等人為之設八關齋會禳祈之。魯公記其境況云：「五月八日（徐向）首以俸錢三十萬

設八關大會，飯千僧于開元伽藍，將佐爭承，唯恐居後，已而州縣官吏長史苗藏實等設一千五百人為一會，鎮遏團練官健副使孫琳等設五百人為一會，耆壽百姓張列等設五千人為一會，法筵等供，仄塞于郊垌，贊唄香花，喧嗔于晝夜。其餘鄉村聚落，來往舟車，聞風而摩。督自勤聳，而休先宵懋者又不可勝數矣。」一次患病的禳祈，竟花費如此巨大，可謂空前絕後，炫耀報德庸俗已極。如此陋劣，魯公竟替他們寫文記述，肆意頌揚，稱之謂：「德厚量深，勞謙重慎。功既高而心益下，位彌大而體益恭，故遠無不懷，邇無不肅。」又說：「德之所感，淪骨髓而非深，誠之所至，去神明而何遠。」可見顏真卿佞佛之深，所以為後人趙頡長嘆息者也。這種思想，不僅影響了顏真卿的處世態度，使之通脫清逸，風流儒雅，而且，也因此影響他的藝術境界。由是可以想見當年在湖州的「燁鵬煥鯤餐未休」（《大言聯句》）；「欲炙待立涎交流」（《饒語聯句》）；「覆軍墜馬皆不醒」（《醉語聯句》）等等詩句中所表現出來與顏真卿平日的端嚴作風判若天淵的近乎滑稽的腔調，并非故作姿態。

正因為顏真卿不復有功名羈絆，其結交隱逸，交游文學，雅好攝生，尤佞佛理，加上政簡務閑，既不外張，亦無自貶，悠然而具王謝之風。故而詩文之外，多寄情翰墨，以書自娛。常常自采樂石，命吏幹磨礪，然後擘窠大書，由家僮鐫刻之。綜觀魯公存世書迹，十有八九出于斯時，顏真卿于書始見矜練，力求文質并重，以臻適宜。所以陳思《墨池篇》稱魯公大曆年間書法千變萬化，各具風韻，《觀《中興頌》則宏偉發揚，狀其功德之盛；觀《家廟碑》則莊重篤實，見其承家之謹；觀《仙壇記》則秀穎超舉，象其志氣之妙；觀《元次山銘》則淳涵深厚，見其業履之純。」陳思之說，雖別具會心，然于魯公晚年之筆，要為篤論。

後人論魯公書法，大抵以《顏氏家廟碑》為其極限，其後之書，由盛入衰，已不見魯公佳作。而其前尤其大曆年間所書的碑版名品，種種不同意趣，天真罄露，莫不為其精神寫照，其中不乏顏魯公書法藝術的代表作。今謹介紹如下：

《麻姑仙壇記》，顏魯公撰書于大曆六年（公元七七一年）四

月（六十三歲）。宋時所見凡大、中、小三本。小字本，即孫承澤所謂「蠅頭小楷」者，前人已斷為偽迹，黃魯直言乃慶曆中一學佛者所書，其猶能道其姓名。大字本，即臨川舊碑斷其一角者，王澐《虛舟題跋》認為「蓋以退筆，因勢而用之，轉益勁健，進乎自然，此其所以神也。」《宣和書譜》及陳思所評秀穎者，也是指大字本而論。中字本，即留元剛忠義堂刻本，文與大字本略同，字則介乎大、小本之間。孫承澤在《庚子銷夏記》中評之說：「字形大如指頂，筆筆帶有隸意，魯公最得意書也。」《虛舟題跋》也說：「顏魯公書，大者無過《中興頌》，小者無過《麻姑壇》，然大小雖殊，精神結構，無毫髮異。熟玩久之，知《中興》非大，《麻姑》非小，則于顏書思過半矣。」

《大唐中興頌》，魯公書于大曆六年（公元七七一年）六月，後《麻姑仙壇記》二個月。文為唐代古文運動先行者元結所撰。文辭古雅遒勁，不愧為「老于文學」者手筆。顏真卿為老友書頌國中興之文，方正平穩，大書深刻，其用筆也瀟灑頓挫，雄厚端嚴。王惲在《玉堂嘉話》稱之謂「雄偉如驅千里駿馬，倚丘山而立。」錢邦芑《涪溪記》說，是書「為平原第一得意書，亦次山（元結）之文有以助其筆力，故與山水相映發耳。」郝經《陵川集》也說：「書至于顏魯公，魯公之書又至于《中興頌》，故為書家規矩準繩之大匠。」

《李玄靖碑》，撰書于大曆十二年（公元七七七年）（六十九歲），「玄靖」為道士李含光道號。顏真卿自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年）升州刺史任上與他結交以來，恩眷綢繆，幾近十年。且其親屬殷淑、韋渠牟并為玄靖門人，在升州時，魯公與其二人「嘗接采真之游，緒聞含一之德」。魯公文章亟稱其德行，謂之「天下道學所宗」。此書，王世貞《弇州山人稿》稱：「結體與《家廟》同，遒勁鬱勃，故是誠懸（柳公權）鼻祖。然視虞永興、褚河南，閭閻氣象，無小乏。」而《虛舟題跋》以為「跌宕莫如《宋廣平》，肅恬莫如《家廟碑》，此碑風格正在《廣平》、《家廟》之間，信是魯公極筆。」

《宋璟碑》，撰書于大曆七年（公元七七二年）撫州任上，時年六十四歲，立石于大曆十三年（公元七七八年），與碑陰記同

時，時年已七十歲。其方整虛和，後之論者大多以為出于褚遂良。其實斯碑乃健筆書寫，且多用腕力，不同于魯公平常之粗鋒飽墨。眾所周知，楷書結字，在初唐以斜畫緊結為主體，歐陽詢父子脫胎于北魏，顯得峻嚴方飭，虞世南、殷全名則平正和美，與隋代智永、丁道護一脉相承，出自二王。至褚遂良出，一改歐、虞舊習，由《龍藏寺》上溯北齊，變為「平畫寬結」。顏真卿楷書結法出自家學，其平畫寬結于晋代已露端倪，《琅琊顏兼婦劉氏墓志》即是顏氏先祖遺則。殊途同歸，與褚氏同一法門，只是顏真卿平常用筆圓勁，別有一番渾厚意趣。所以當他一改細挺，便似褚氏風韻，并非是他有意仿寫，追求褚家異趣。

大曆年間，顏真卿不獨楷書出神入化，包羅篆隸，一變古法，行草書亦真、行相間，放拘并遣，篆筆隸格，提按頓挫，沉雄奇古，誠如蘇東坡所謂「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晋宋以來風流」。其間《送劉太冲序》、《裴將軍詩》堪稱典型。

《送劉太冲序》，作于大曆七年（公元七七二年）。劉太冲，蕭穎士子弟劉太真之兄，顏真卿平原首舉義旗之時，曾邀請他共拒胡羯，立下汗馬之功。大曆六年（公元七七一年）顏真卿卸任撫州，東游吳越時，又相遇于江寧，并得其幫助，解除困境。這篇文章即記其事。此序書法歷來為論書者所重視，認為腴潤秀勁，是顏書之冠。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說：「鬱屈瑰奇，于二王法外，別有異趣，米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者目驚」，不虛也。」《竹雲題跋》也說：「顏書多遒古，此叙獨秀潤有姿態，為顏書最宜人之作。」又說：「此叙碧箋書。碧箋宜墨，故在顏書中獨為腴潤。」《裴將軍詩》，或疑非顏所書，但觀《忠義堂帖》所收是書，大氣磅礴，正非魯公莫屬。參閱《忠義堂帖》行草諸帖，尤其《劉中使帖》，筆力雄健，其縱橫遒古，一如是題額。蓋書于湖州任上，與《劉中使帖》相先後。沙孟海先生已考之鑿鑿。不獨沙孟海先生稱述是書，有明一代論書家如董其昌、王澐也甚重其帖。王世貞《弇州山人稿》說：「顏魯公《送裴將軍詩》多感慨踔厲，是公合作語。……書兼正行體，有若篆籀者，其筆勢雄強勁逸，有一掣萬鈞之力，掘古處，幾若不可識。然所謂印印泥、錐畫沙、

折釵股、屋漏痕者，蓋兼得之矣。」《虛舟題跋》也說：「書兼楷行草，若篆若籀，雄絕一時，余題爲魯公第一奇迹，不虛也。」又說：「米海岳論《爭坐位》謂「其字相聯屬，詭異飛動得于意外，最爲杰思。」黃山谷云：「奇杰秀拔，奄有魏晉唐以來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皆爲法度所掩，豈若魯公肅然出于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二公之推許《論坐》如此，余謂特未見此書耳。此書詭異飛動出《論坐》外，蓋自右軍來未聞此境，其心目中不復欲存右軍一筆，蓋所謂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者也。然非有一段忠義鬱勃之氣，發于筆墨之外，未由臻此。」

至于顏真卿與草書大家懷素的儒釋之交，也發生在這段時期。當年懷素自零陵出發，經衡陽，客譚州，南游廣州，北上岳州，然後懷素入秦，大曆初年至長安，經禮部侍郎張謂譽揚，名噪京師。這時顏真卿罷撫州刺史事，于大曆七年（公元七七二年）九月至東京待命，而懷素正從長安歸鄉，路經洛陽，偶遇魯公，因而懇請爲他所收集的當代名流稱譽歌行集作序。顏真卿欣然同意，寫了《懷素上人草書歌序》一文，極稱其草書之精絕。他說：「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概通疏，性靈豁暢，精心草聖，積歲有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侍郎章公陟，睹其筆力，勸以有助，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共游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盈卷軸。夫草稿之作，起于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于伯英（張芝），尤擅其美，羲（王羲之）、獻（王獻之）茲降，虞（虞世南）、陸（陸柬之）相承，口訣手授，以至于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真正。真卿早歲，常接游處，屢蒙激勸，告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用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群，迅疾駭人，若還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亟揖規模，則入室之賓，舍子奚適，嗟嘆不足，聊書以冠諸篇首。」（《顏魯公文集》卷五）

張旭不獨草書雄逸絕倫，楷書也出規入矩，其平實謹嚴，簡遠精妙，不在唐賢之下，所以顏真卿稱爲「楷法精詳，特爲真正」。而序所謂：「向使師得親承善誘，亟揖規模，則入室之賓，舍子奚適」云云，則寓有深意。懷素受顏真卿的啓發，始入規矩。他說：

「近于洛下偶逢顏尚書真卿，自云頗傳長史筆法，聞斯八法，若有所得也。」（《藏真帖》）綜觀懷素以後的書作，如《苦筭》、《論書》、以及《小草千字文》，凝神處不失規律，且多見魯公筆意，或許懷素從魯公而悟筆法，不復專謹草書，以肆恣爲能事了。鄭杓《衍極》說：「魯公之書，懷素喜而有得，似不在語言、文字之宜乎。」這話是可信的。

陸羽《懷素別傳》所記顏真卿與懷素論書語，所謂「夏雲多奇峰」，「飛鳥入林，驚蛇入草」，「折壁之路，一一自然」，「何如屋漏痕」，以及鄔彤所引張旭「孤蓬自振，驚沙坐飛」等等巧喻妙句，也當在其同時。陸羽也是最早評論顏魯公書法的友朋之一。他曾將魯公書法與徐浩相提并論，認爲「徐吏部不授右軍筆法，而體裁似右軍，顏太保授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識君子曰：「蓋以徐得右軍皮膚鼻眼也，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心肺也，所以不似。」此論雖然以王羲之爲顏、徐兩家書法的唯一淵源所出，且以皮膚眼鼻、筋骨心肺相比喻，純屬文人臆評，不可作爲確論，但他視顏真卿高于徐浩一籌，這在徐浩《亞相書翰凌獻之》、聲名并着的當時，不可不謂真知灼見。

顏真卿與徐浩一樣，他們的書法藝術純粹是從游藝出發的，寄寓着極大的功利主義思想。大曆九年所立的《乞御書放生碑額表并碑陰記》便是明證。當年顏真卿在侍郎任上，適逢肅宗改元，且詔天下州郡臨江帶郭上下五里處各置放生池，從洋州興道縣（今陝西洋縣）開始，到山南、劍南、黔中、荆南、嶺南、江西、浙西諸道，迄于升州江寧縣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顏真卿于三月用俸錢往當周（今四川松潘）采石，并書撰《天下放生碑銘》記述此事。七月，復奏請肅宗御題碑額以光揚不朽之業。後又嫌當時所書的碑銘，點畫稍細，恐怕不能傳之久遠，又特地擘窠大書，另寫一本，幾竭盡懷懷之誠而後安。肅宗非常高興，不獨欣然命筆親書碑額，還表揚了顏真卿。顏真卿上表說：「昔秦始皇暴虐之君，李斯邪諂之臣，猶刻金石，垂于後代；魏帝外禪之主，鍾繇偏方之佐，亦于繁昌立表頌德，況陛下以巍巍功業，而無紀述，則臣竊耻之。」（《顏魯公文集》卷一）唐肅宗雖稱中興之主，但是

「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司馬光《資治通鑒》評肅宗語），實際上是一位目光短淺、識度平庸的昏君。他不獨倚重宦官，養癰遺患，開宦官專權之門，且猜忌功臣，姑息藩鎮，尤其對那些攻忤奪驚、眄眄然伺位篡權之人不加制約，致使朝廷內部派係鬥爭愈演愈烈，最後肇致藩鎮割據的局面。『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授命』（《資治通鑒》卷二十乾元元年條下按語）。肅宗放生只是一種封建皇帝的煦煦小仁，無足稱道，而顏真卿擘窠大書，極盡其歌功頌德之能事，已有求媚邀寵之嫌，更何況抑秦皇、魏武，面腴庸主。聯想到顏真卿依傍王鉷、援救宋渾以及頌揚魚朝恩、鮮于仲通、田神功之流，不獨可以懷疑他的政治識見是何等的低下，而且亦可見其書法之所以適用記事、矜練楷正的功用所在。

顏真卿存世不見論書之作，惟有文論一篇，或可從中窺見其藝術觀點。永泰元年（公元七六五年）八月顏真卿在《刑部侍郎孫逖文集序》中說：『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歌咏，終乎《雅》、《頌》。帝庸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于此。然而文勝質則綉其鞶帨，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于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漢魏以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禮聿興。既馳騁于末流，遂受嗤于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睹』；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頹波，雖無害于過正，推其中論，不亦傷于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爲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

文章有三層意思：其一，文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歌咏，終于《雅》、《頌》』，換句話說便是文始于言志，而終于載道；其二，歷來文章或重文輕質，或重質輕文，各有偏頗，不能適中；其三，《雅》、《鄭》之文，歷代兼有，而前賢鄙薄宮禮，以爲繁縟，實失之于厚誣。因此可說，顏真卿在文以載道的基礎上，主張重視形式的文采，使之能更好地發揮言志抒情的功能。這個觀點也出自《顏氏家訓》。顏之推曾根據劉勰的《文心雕龍》闡述文學

批評的準則，說：『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弃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但務去泰去甚耳。』又說：『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疏樸，未爲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并須兩存，不可偏弃也。』《顏氏家訓》卷四《文章第九》簡言之，文章以典正爲上，也就是以思想性爲第一，藝術性爲第二，在此基礎上，發揮才氣的作用，盡量地使文章的文采和實質能配合適宜。究其實，這種理論觀點也是孔子『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的具體闡述。

公元七十七年（大曆十二年）三月，奸相元載伏誅，在中書郎楊綰和門下侍郎常袞的推薦下，顏真卿奉詔入朝，于八月甲辰（九月二十五日）到長安，出任刑部尚書，時年六十九歲。按唐代的致仕制度，凡年七十者，必須退休。于是顏真卿在出任尚書的第二年，就三次上書要求告老還鄉，然而被朝廷挽留了下來。不久，改任爲吏部尚書，至公元七十九年（大曆十四年）五月，代宗去世，德宗即位，顏魯公又以吏部尚書充當禮儀使，參定朝廷禮儀。顏真卿時任散官光祿大夫，勳爵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階高二品，且執掌吏部，兼任禮儀，權勢并重。顏氏自五世祖顏之推以來，一門六代，無有魯公之顯赫，且『太后（沈氏）崇徽，外家相屬』（《顏魯公文集》卷十七《授顏真卿太子少師告》），身爲皇帝遠房親戚，恩榮并殊于常人。所以魯公躊躇滿志，顧盼自雄，自撰《顏氏家譜》敷演家聲，改敦化坊祖宅爲顏氏祠堂，又爲父立廟，并書撰神道碑銘頌揚之。此即後世所稱道的《顏氏家廟碑》。建中元年（公元七八〇年）八月，魯公又蒙恩升任太子少師，子侄八人又同時封爵，興奮之餘，復書撰《碑後記》。

此碑李陽冰題額。楷碑篆額，世稱『雙璧』。王世貞曾評之說：『今隸中之有玉篆體者，風華骨格，莊密挺秀，其書家至寶。』（《弇州山人續稿》）王澐在《虛舟題跋》中也說：『評者議魯公書，真不及草，草不及稿，以太方嚴爲魯公病，豈知寧樸無華，寧拙無巧，故是篆籀正法。此《家廟碑》乃公用力深至之作，……年高筆老，

風力適厚，又為家廟立碑，挾泰山岩岩之象，加以俎豆肅穆之意，故其為書莊嚴端慤，如殷商周鼎彝，不可逼視。」明賢所評雖然如此，但亦不無異議者，如楊賓《鐵函齋書跋》說：「《顏氏家廟碑》、《宣和書譜》則稱之曰「莊重」；弇州則曰「風稜秀出，精彩注射」；趙岫則曰「結法與《東方贊》正同，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予則以為魯公楷書，自當以《宋文貞公碑側記》為第一，其次則《文貞碑》，又其次《東方朔》，其次《中興頌》，其次《郭敬之家廟碑》，又其次乃此碑耳。」蓋此碑魯公最晚所書，年事高邁，精力殫竭，且稱述祖德，意緒肅敬，二乖雙遭，終難奇絕。至于同時的《朱巨川》和《太子少師》兩告，或以為「古勁雄偉」，但細究其實并非魯公真迹。

#### 四

德宗即位之後，任用元載的餘黨楊炎為宰相，楊炎由于推行『兩税法』，歲收比行租庸調法有所改進，所以日益受到信任。唐代宗誅元載時，顏真卿的知遇劉晏曾參與密謀，楊炎便利用寵遇進讒言誘使德宗誣殺劉晏，為元載報仇。劉晏無罪被殺，一時朝廷沸然，為之側目。顏真卿也因為耿介正直，為楊炎所忌，不久即被免去吏部之職，改任為皇太子李誦的太子少師，依舊充任禮儀使。太子少師，正二品，位雖崇高，但無實權，正如史書所稱是一種『外行崇寵，實去其權』的陰謀。不久盧杞代楊炎為相，更惡顏公，竟免去禮儀使，改任為太子太師。盧杞，字子良，玄宗相懷慎之孫，盧杞的父親即被安祿山殺死，并由段子光傳首平原的洛陽東臺御史中丞盧奕。史稱：德宗「初即位，崔佑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為有貞觀之風；及盧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此疑似離間群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七）。盧杞雖然把顏真卿升為階高一品的『東宮三太』之一，使他成為一位徒有虛名、並無實權的清望官，但畢竟還在朝廷，且為四代元老，皇親國戚，所以千方百計想把他排擠到地方上去。曾經派人徵求顏魯公意見，以出任哪一方面的事務為宜，魯公聽後十分生氣，便到中書省衙門加以責問，

說：「真卿因為性格褊躁，為小人所憎，竄逐不止一次，今天已經羸老，幸虧宰相的庇護。宰相的先父御史中丞盧奕曾經被安祿山傳首到平原，面上有血痕，真卿不敢用衣去拭，硬是用舌舔淨，相公能忍不相容嗎？」盧杞聽了這話，矍然下拜，然而對魯公則益加銜恨。對此，胡三省《通鑑辨誤》曾有評論：「魯公清忠直道，再為常伯（尚書之謂）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知己矣，年逾七十致仕而歸，不亦善乎！而與盧杞同朝，且有不相容之訴，而觸其所惡，聞者難以言智矣。」洪邁在《容齋隨筆》中也為之扼腕嘆息，他說：「盧杞之擅國也，欲去公，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公往見之，責其不見容，由是銜憾切骨。是年七十有五，竟墮杞之詭計而死，議者痛之。嗚呼，公既知杞之惡己，或因其方鎮之問，欣然從之，不然則高舉遠引，挂冠東去。杞之所甚欲也，而乃眷眷京都，終不自為去就，以蹈危機，《春秋》責備賢者，斯為可憾。……雖然公囚于淮西，屢折李希烈，卒之損身殉國，以激四海義烈之氣，貞元反正，實為有助焉。豈天欲全界公以萬世之名，故使一時墮于橫逆，以成始成終者乎？」

安史之亂之後，各地節度使大部分是安祿山、史思明的舊部。雖然朝廷寵特加恩，但多心懷猜疑，他們連衡盤結，擁兵自固，修兵甲，整城池，獨霸一方，且私徵賦稅，承繼職位，終於形成地方割據勢力，嚴重威脅唐王朝的統一。公元七八二年（建中三年）十一月一日幽州節度使朱滔稱冀王，魏博節度使田悅稱魏王，淄青節度使李納稱齊王，恒冀觀察使王武俊稱趙王，以朱滔為盟主。這時，朝廷派遣李希烈以淮寧節度使兼平盧、淄、青、衞、鄆、登、萊、齊節度使的身份，帶領三萬兵馬討伐李納。不料，李希烈一到許州（今河南許昌），便與李納相互勾結，聯兵奪取汴州（今河南開封）。至公元七八二年（建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第二年正月李希烈攻陷汝州（州治在今河南臨汝），又派兵四出抄襲掠奪，取尉氏（今河南尉氏）、圍鄭州、威脅洛陽，士民為之震駭。德宗急召宰相盧杞商議安撫李希烈的辦法，盧杞便乘機對德宗說：「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逆順禍福，希烈